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下的政治改革－ 現代化理論的再檢證

曾美智

國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

摘 要

從政治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英國的社會學大師史賓賽(Herbert Spencer)、將歐洲社會學傳入美國的帕深思(Talcott Parsons)、政治社會學著名學者李普賽(Seymour Martin Lipset)，到專研民主化的當代政治學大師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無一不認為經濟的發展將帶來社會的劇烈變遷、價值的多元化，以及必須以民主制度來整合各種利益衝突的要求。

¹而現代化理論正是強調一個國家對於社會經濟結構與政治制度間有著緊密的關聯性存在。然而此一推論對於自 1978 年經濟改革後，經濟高度成長的中國大陸而言，目前尚未產生現代化理論所預言在高度經濟發展後，隨之帶來的政治體制改革現象，其理論適用是否與其他地區研究，存有不同重大變因。因而本文擬就中國大陸近年經濟發展與政治制度改革予以比較分析，再次檢證現代化理論之觀點。

關鍵詞：現代化理論、經濟發展、政治改革、計畫經濟、市場經濟

¹ 吳玉山，〈現代化理論與政權穩定論〉，《政治科學論叢》(臺北：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期 9，1998 年 6 月，頁 445。

壹、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民主陣營的領袖，為避免世界遭共黨陣營赤化，因而在政府支持下設立許多研究機構用以專門研究第三世界國家，現代化理論便因而產生。²現代化理論在此時空條件與背景下，因而在 1950 和 1960 年代主宰了比較政治學研究領域，隨後又在 1980 年代末重新興起的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paradigm)研究中，將最重要的命題置於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將帶來政治的開放和民主化議題上。³故而現代化理論可謂曾是政治發展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流派，尤其在 1960、1970 年代間，由於已開發國家各種經濟、社會危機的出現，未開發國家發展過程的明顯停滯，以及依賴理論等對立理論的興起，現代化理論受到程度上的衝擊和挑戰，其發展呈現出相對停滯狀態。1970 年代末，尤其是 1980 年代以來，部分是由於依賴理論等理論自身也具有種種局限，部分是由於現代化理論家們在對自家理論進行革新方面所作的種種努力，現代化理論作為一個學術流派又重新活躍起來，並正在重新獲得日趨增強的影響。⁴現代化理論認為經濟發展程度的高低決定對民主的需求，也就是經濟發展程度低則對民主的需求低，經濟發展程度高則對民主的需求高。⁵21 世紀後，中國大陸的崛起引發世界政經局勢的重大變化，西方學者對於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大陸經濟改革與發展紛紛投以關注與研究，現代化理論經濟發展必然帶來政治民主的政治改革推論又受到程度上的重視。不可諱言，相較於全世界國家，中國大陸在經濟的發展上取得高度成就，然而中國大陸自 1978 年的經濟改革開放迄今已逾 30 年，其國家治理手段雖有變動跡象，然是否果真能如現代化理論我推演，將中國大陸帶來政治改革並往民主國家體制發展，殊值後續觀察與研究。

貳、現代化理論

現代化理論係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思潮而對人類社會發展提出的一種看法；認為所有社會均循著同樣的軌跡，經歷同樣的階段，邁向同樣的目標而發展，目前各個社會的差異只是在同樣一條進化的道路上，站的位置不同。⁶現代化理論研究的政治學方向以杭廷頓、伊斯頓、艾爾蒙、李普賽等為代表，這些學者認為政治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的核心，現代化最顯著的特徵是國家政治制度的現代化，並從政治結構的分化與政治參與的擴大來解釋現代化。⁷當然現代化理論的研究領域分眾，為免研究失焦，本文僅就政治理論的觀點進行分析。

一、現代化理論的取向

現代化理論乃是西方社會於二戰後，對於亞拉非等落後地區國家所揭諸的社會發展變遷理論，這些主要的西方研究學者認為，現代化是不會逆轉的，現代化將是一路前進的，現代化具有某些特徵，而最後所有社會都將成為現代化社會。⁸其具有以下幾項基本內涵：⁹

² 吳文程，《政治發展與民主轉型》(臺北：五南文化)，2007 年，頁 135。

³ 吳玉山，〈現代化理論與政權穩定論〉，《政治科學論叢》(臺北：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期 9，1998 年 6 月，頁 443。

⁴ 謝立中，〈現代化理論的過去與現在〉，《社為科學研究》，1998 年 1 月，頁 67，見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research_doc/xielizhong/xielizhong1998_1，2017/1/14。

⁵ 吳玉山，〈現代化理論與政權穩定論〉，《政治科學論叢》(臺北：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期 9，1998 年 6 月，頁 454。

⁶ 蔡清華，《教育大辭書》，2010/12，見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0586/>，2017/1/10。

⁷ 鄭州，〈改革與理論〉，《中國政治》，2013/9/10，見 <http://www.rocidea.com/roc-20321.aspx>，2017/1/13。

⁸ 吳文程，《政治發展與民主轉型》(臺北：五南文化)，2007 年，頁 137。

⁹ 饒旭鵬、周娟，〈現代化理論的回顧及對中國的啟示〉，《中國石油大學學報》，期 4，卷 32，2016 年 8 月，頁 66-67。

1. 現代化的精神動力是理性的，現代化理論認為現代化的價值取向，即理性化，它十分重視改造傳統文化，認為現代化的精神動力就是人的理性化，力圖借助文化價值觀念來徹底改變發展中國家。
2. 現代化的目標是歐美化，現代化理論家大多來自歐美國家，他們認為“現代化是一個朝歐美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系統演變的過程，發展中國家要想實現發展，就必須按照歐美模式經歷全面的改革。
3. 現代化的路徑是從傳統走向現代，現代化理論家認為現代化就是從傳統社會變遷到現代社會，他們將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放在同一條歷史發展脈絡上，認為社會是一個逐漸進化的有機體，這種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轉變的社會進化思想貫穿現代化理論整體。

二、現代化理論的假設

現代化理論學者大多認為，傳統社會是現代化社會的對照，社會必須現代化才是正確的道路，唯有遵循現代化國家的道路，才能幫助傳統社會國家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¹⁰因而對於現代化理論的演繹與批判論者眾，正主要是因為現代化理論背後隱含著許多的假設，這些假設可大致歸納為以下幾點：¹¹

1. 可欲性及可能性，即任一社會只要有動機，都有可能從未開發社會發展到開發中社會，進而到達已開發社會。
2. 一般性與普遍性，當一個社會變遷成為現代化社會，都具有共同及普遍的模式。
3. 無限性及樂觀性，對於社會的發展，現代化理論是樂觀性的假設，認為社會是一直往前邁進，永無休止的。
4. 發展障礙的內在性，一個社會的演變或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主要受內在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的影響。

三、現代化理論的性質

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曾以「革命的、複雜的、系統的、全球的、長期的、階段性的、同質的、不可逆轉的」，以及「進步的過程」等9個形容詞，來解釋現代化理論所描繪的國家社會進程。¹²綜整研究可以發現，現代化理論具有以下性質：¹³

1. 現代化理論具有複雜性，現代化理論認為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兩者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性，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變涉及人類生活模式的根本性、總體性的變遷，它實際上涉及人類思想和行為一切領域的變化。
2. 現代化理論具有長期性，現代化理論認為現代化所涉及的總體性變遷是經過長期才能實現，從傳統社會中發生的變化來看，現代化確實是一種改革變遷的過程，而從這些變化所需要的時間來看，現代化又是一種漸進的過程。
3. 現代化理論具有系統性，現代化理論也認為社會系統中任何一個因素的變化都是與其他因素相聯繫的，並會影響其他因素的變化。
4. 現代化理論具有階段性，現代化理論認為一切社會進行現代化的過程都可以區別出不同的階段，現代化雖然是從傳統階段開始而以現代階段告終，但這兩個時期中的過渡階段還可以劃分出幾個不同的階段，這樣，就可以根據一個社會從傳統性向現代性轉

¹⁰ 吳文程，《政治發展與民主轉型》（臺北：五南文化），2007年，頁136-137。

¹¹ 王湧泉，〈現代化與臺灣發展〉，《高雄科學技術學院學報》（高雄：高雄科技大學），期27，1997年12月，頁421-422。

¹² 吳文程，《政治發展與民主轉型》（臺北：五南文化），2007年，頁136。

¹³ 韓廣富、王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經典現代化理論比較〉，《學習與探索》，期194，2011年，頁81。

變的程度來對其進行分析比較和確定它的發展程度。¹⁴

5. 現代化存在基礎問題，現代化理論也認為 經濟增長使人更能控制自己的環境，從而增加了自己的自由，而現代化首先和主要是由經濟增長帶來的，經濟增長引起產業結構、社會結構、政治體制、思想觀念等發生一系列適應性的變化，對這些基礎變化的整合就是現代化。
6. 現代化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由於現代化具有普遍性，所有與之接觸的社會與領域都不可能長期抵抗住它的融合，而且在任何一個社會中，現代化一旦開始，將不會被真正的抑制，雖然有可能產生暫時的挫折，但在根本上來說，現代化一旦發生趨勢將不可逆轉。¹⁵

雖然相關研究亦曾指出現代化理論的觀點過於樂觀，而且在相當程度上忽略除了經濟以外的社會、文化等相關變因的影響程度。但綜整以上學者對於各項有關現代化理論的取向、假設與性質的研究仍可發現，現代化理論中的政治現代化方面認知上，仍是以西方先進國家的發展經驗與觀點為指導，並在理論的核心上認為非西方等未開發國家只有遵循西方國家開發的過程才是達成自身正向轉變的唯一道路，而經濟的持續與高度發展必然帶來國家政治的民主化。

參、大陸經改後的經濟發展情況

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迄今已逾 30 年，建政迄今也屆滿一甲子有餘，就整體國家發展過程分析可知，自 1978 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政策可謂是中國大陸由貧轉富、由弱轉強的關鍵。¹⁶若無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開放政策，繼續堅持共產計劃經濟，中國大陸今日極可能仍是另一個北韓，故而本文僅就鄧小平經改後的情況予以觀察分析。

一、鄧小平時期的經濟改革

1978 年 12 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大陸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將黨和國家的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後，隨即展開經濟改革行動，第一階段的改革從 1978 年 12 月到 1984 年 10 月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大陸經濟在「計畫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經濟體制原則下運行，從傳統計畫經濟體制的邊界上開始向市場經濟轉軌。¹⁷在這個階段中，農村地區之改革主要在解決農民與集體的關係，提高農村生產力，較重要的改革措施有：1.在土地等主要農業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的前提下，實行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把原屬於集體所有的土地承包給農民家庭分散經營。到 1984 年底止，已有 1.8 億農戶採用了各種形式的承包生產責任制，佔全大陸農戶總數的 98%左右。2.取消了政經合一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復了鄉村政權組織。3.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例如在糧食收購上，1979 年平均提高 20.1%，1980 年又提高了 8.1%。¹⁸在企業方面，中國大陸於 1978 年開始在四川省試驗施行此種向企業「放權讓利」的作法並逐漸的向全國推廣，到 1979 年年底，中國大陸已經在全國各地的 6600 個國有工業企業實驗此種經濟改革方式，並成功的提升生產能力與經營績效，占中國大陸工業企業總產值的 60%，利

¹⁴ 階段論觀點亦同見於吳文程，《政治發展與民主轉型》（臺北：五南文化），2007 年，頁 140。

¹⁵ 謝立中，〈現代化理論的過去與現在〉，《社為科學研究》，1998 年 1 月，頁 68，見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research_doc/xielizhong/xielizhong1998_1，2017/1/14。

¹⁶ 顧立民，〈改革以來中共的國家發展與規劃〉，《國防大學校八十六週年慶暨通識研討會論文集》（桃園：國防大學），2010 年 9 月，頁 43。

¹⁷ 〈大陸經濟體制改革〉（臺北：五南文化），見 <http://www.wunan.com.tw/www2/download/preview/1064.PDF>，頁 3，2017/2/1。

¹⁸ 〈大陸經濟體制改革〉（臺北：五南文化），見 <http://www.wunan.com.tw/www2/download/preview/1064.PDF>，頁 3，2017/2/1。

潤占工業利潤總利潤的 70%。¹⁹其後從 1984 年 10 月至 1992 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召開前，從 198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作出改革重點轉向城市的決定開始，到 1988 年 9 月治理整頓深化改革的決策，再到 1992 年「十四大」提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這一段期間，經濟體制改革的特徵是建立「有計畫的商品經濟」。²⁰1992 年是大陸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歷程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這一年鄧小平的南巡談話，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並在 10 月份中共中央召開的「十四大」，結束了過去「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模式，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全面加速推動經濟改革。²¹

二、江澤民後的經濟改革路線

鄧小平死後，自 1989 到 2002 年，由江澤民接任中央總書記，由於江澤民是中共當權派內的經濟右派，自然而然在其接任中共總書記後，仍然繼續推行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開放路線，甚而有加大步調的情況。江澤民於 1997 年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提到，在新世紀將要到來的時刻，我們面對著嚴峻的挑戰，更面對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和大好機遇，²²在十五大江澤民發表「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的報告中，清楚論述中國大陸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之基本綱領，仍舊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路線，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²³其又在 2003 年 12 月在紀念毛澤東誕辰 110 週年座談會中又表示：「黨和人民在新世紀階段的任務，就是緊緊抓住並充分運用本世紀頭二十年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²⁴江澤民在經濟開放上不僅走的是鄧小平後的改革路線，基本上還採取了更加開放的經濟步調，到了 2002 年江澤民領導班子交班時，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值已經從 1997 年的 7.4 萬億元增加到 2002 年的 10.2 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平均每年增長高達 7.7%。²⁵

2002 年胡錦濤接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其在經濟上係以市場化與產權改革上的持續，但腳步放慢，市場化改革主要在要素市場，更強調降低社會差距，和諧社會的發展，在所得分配、社會福利與保險、環保與能源上更為側重，在此經濟發展的目標與策略轉向下，²⁶胡錦濤於十六大報告即揭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目標，提出包括國內生產總值到 2020 年時要比 2000 年「翻兩番」、「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基本實現工業化」、「大力推進信息化」等任務，要求在前十年（2001 年-2010 年）使經濟總量、綜合國力與人民生活水準「再上一個大台階」。²⁷

雖然胡錦濤在 2002 年接任中共總書記後，走的仍是鄧小平、江澤民的基本經濟改革路線，但胡錦濤已指出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大陸經濟與世界經濟之間的聯繫越來越緊密，世界經濟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準確把握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

¹⁹ 馮銘翰，〈依賴或互賴？論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大陸研究》（臺北：臺灣日本綜合研究所），2006 年 2 月），見 <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chinaresearch-108.asp>，2017/1/2。

²⁰ 〈大陸經濟體制改革〉（臺北：五南文化），見 <http://www.wunan.com.tw/www2/download/preview/1064.PDF>，頁 4，2017/2/1。

²¹ 〈大陸經濟體制改革〉（臺北：五南文化），見 <http://www.wunan.com.tw/www2/download/preview/1064.PDF>，頁 6，2017/2/1。

²² 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頁 4。

²³ 王官德等著，《中國共產黨史》（臺北：五南圖書），2003 年 7 月，頁 556。

²⁴ 顧立民，〈改革以來中共的國家發展與規劃〉，《國防大學校八十六週年慶暨通識研討會論文集》（桃園：國防大學），2010 年 9 月，頁 44。

²⁵ 朱鎔基，〈2003 年政府工作報告〉，2003/3/5，見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test/2006-02/16/content_201173.htm，2017/1/15。

²⁶ 張榮豐，〈中國大陸經濟研究與後 EFCA 時期的大陸政策〉，（臺北：中華經濟研究院），2002 年 6 月，頁 13。

²⁷ 胡錦濤，〈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頁 15-16。

和國際市場變化的走勢，對於更好的促進中國經濟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²⁸對此，胡錦濤在 2006 年的「六二五講話」中講的非常清楚，「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便是「發展」，並不否定發展，經濟成長仍然是共產黨賴以維持統治的最大基礎，此與其他威權國家並無不同。²⁹2012 年後，習近平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也是大陸經濟政策主導者，在 2013 年 11 月 12 日閉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明確提出進一步重視市場作用的改革路線，³⁰他的經濟思維，主要是認識及引領新常態、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適度擴大總需求、穩中求進、兼顧效率與公平等。³¹基本上，無論是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中國大陸領導人都是持續著鄧小平經濟改革開放的傳統路線，建設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

三、中國大陸經濟整體經濟成長

經濟發展的內涵非常明確，學界慣以國民生產毛額（GNP）為指標。³²自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後，雖然經歷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到現任習近平等不同領導時期，即便渠等在政策口號以及經濟產業等發展重點上或有差異，但就中國大陸整體國家社會上的經濟面向，在歷經逾 30 年後，已實質完成兩大轉型：其一是由計劃體制轉型為市場經濟；其二是大量農業剩餘勞動向工業部門移轉，提高了資源使用效率，造成中國大陸經濟長期的高速成長，在出口擴張政策上更是效果顯著，進出口貿易總額超過上兆美元，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³³透過下圖顯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下，2015 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 676708 億元，比 2014 年增長 6.9%。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 60863 億元，增長 3.9%；第二產業增加值 274278 億元，增長 6.0%；第三產業增加值 341567 億元，增長 8.3%，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 9.0%，第二產業增加值比重為 40.5%，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為 50.5%，首次突破 50%，³⁴全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49351 元，比上年增長 6.3%。全年國民總收入 673021 億元。³⁵

²⁸ 《中國共產黨新聞》，〈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論開放〉，2003 年 1 月 28 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見 <http://cpc.people.com.cn/BIG5/85037/85041/7350771.html>，2017/1/23。

²⁹ 趙建民，〈科學發展觀與胡錦濤路線〉，《展望與探索》（臺北：展望與探索），期 12，卷 5，2007 年，頁 43。

³⁰ 日本經濟新聞，〈習近平經濟學浮出水面〉，2013/11/25，見 <http://zh.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column/7132-20131125.html>，2017/2/14。

³¹ 社論，〈習近平經濟學面對新年的新挑戰〉，2016/12/21，見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1221000076-260202>，2017/2/15。

³² 蔡文軒，〈解釋中國大陸省級政治改革：政績/派系模式的思考〉，《政治科學論叢》（臺北：臺灣大學），期 44，2000 年 6 月，頁 109。

³³ 張榮豐，〈中國大陸經濟研究與後 EFCA 時期的大陸政策〉，（臺北：中華經濟研究院），2002 年 6 月，頁 10。

³⁴ 第一產業，又稱第一次產業係指以利用自然力為主，生產不必經過深度加工就可消費的產品或工業原料的部門；第二產業是對第一產業和本產業提供的產品（原料）進行加工的部門，包括採礦業，製造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建築業；第三產業是指除第一、二產業以外的其他行業，又稱第三次產業，係指不生產物質產品的行業，即服務業。第三產業，又稱第三次產業，是英國經濟學家、紐西蘭奧塔哥大學教授費希爾 1935 年在《安全與進步的衝突》一書中首先提出來的。

³⁵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15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6/2/9，見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2/t20160229_1323991.html，2017/2/20。

圖1 2011-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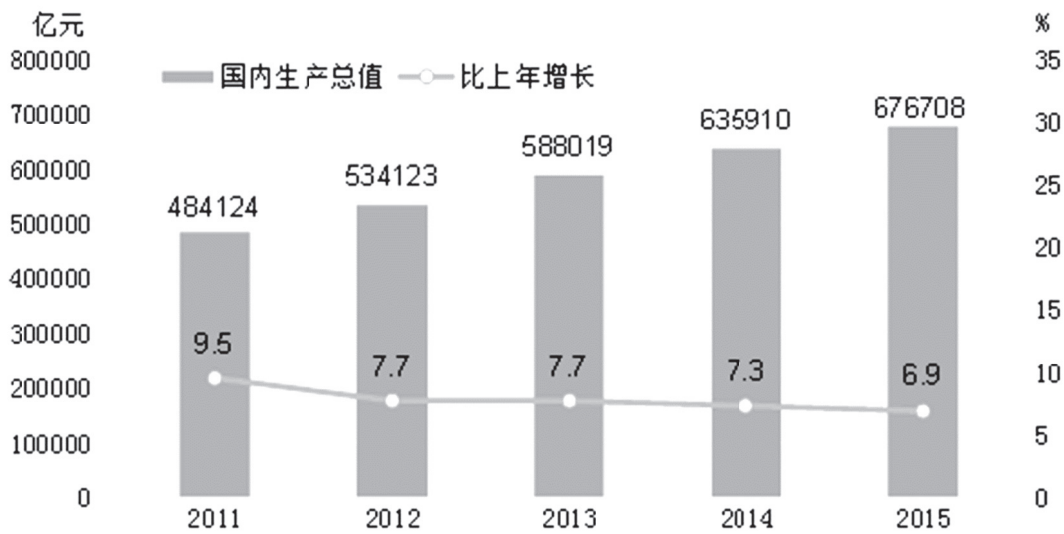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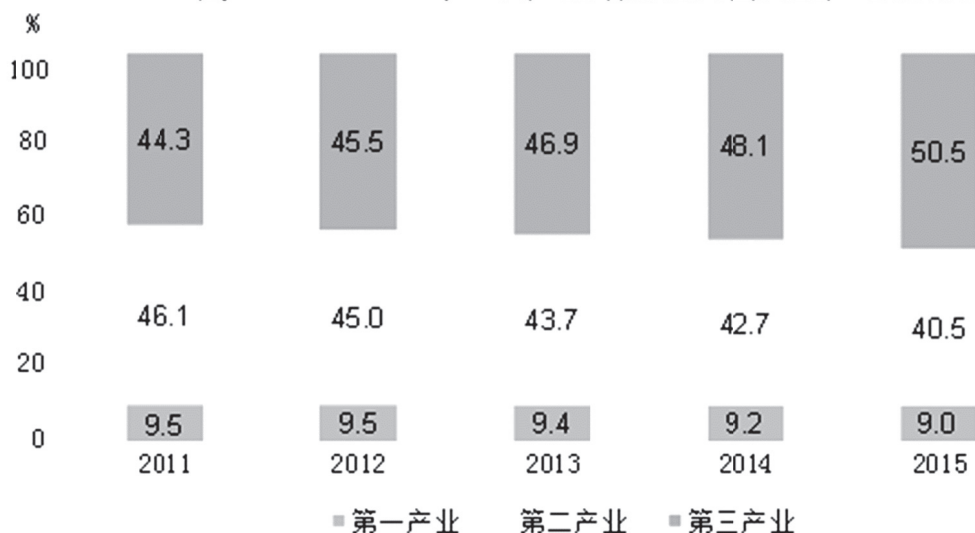


圖2 2011-2015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15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6/2/9，見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2/t20160229_1323991.html，2017/2/20。

在圖1、2之前，若再向時序前回顧中國大陸自1979年至2006年間的經濟成長更加發現，期間中國大陸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平均增長9.7%，據統計僅2003年中國大陸的外匯準備即高達4,032.5億美元，足足比2002年劇增1,168.4億美元，經濟成長速度驚人。³⁶到了2006年，中國大陸已經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日本與德國，在國際貿易方面，中國從1978年的世界第32位貿易國家竄升到2006年的第三大出口國，成長率高達27.2%，到2007年中國出口持續快速增長，月出口總值更高達5,467億美元，成為全球第二大出口國，更在2009年超越德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出口國，中國經濟的高度發展已是無法否定的事實。³⁷即便在2010到2016年世界金融振盪，國際整體經濟成長最低時期，中國大陸年國內生產

³⁶ 張弘遠，〈2004年中國大陸經濟的回顧與展望〉，《展望與探索》（臺北：展望與探索），期1，卷3，2005年，頁11-12。

³⁷ 褚耐安等譯，Peter Navarro 著，《即將到來的對中國戰爭》*The Coming China Wars: Where They Will Be Fought*

總值仍達到 67.7 萬億元，年增長 6.9%。³⁸充分展現自鄧小平經濟改革開放後整體經濟的高度現代化趨勢。

肆、大陸經濟發展後的政治改革與現代化理論

在中共經歷 30 年的改革開放與經濟建設成功後，當前最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已經不是生產力落後與人民群眾需求增加的問題，而是弱勢群體相對的日益貧窮與特權階級日益富裕的貧富懸殊矛盾，若不加改革，有重蹈蘇聯解體覆轍之可能，部份學者研究認為，要消除這種危機，唯一的出路就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³⁹也就是對於中國大陸在經濟發展與社會結構變遷下，對國家的公共秩序與權威性分配改變。⁴⁰而在實務層面上，亦有觀察到有部份類似政治改革跡象產生。

一、中國大陸主要政治改革內涵

自 1978 年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政府針對舊體制進行了幾次大規模的政府改革，這幾次政府改革基本上是一種行政發展型的改革，它歷經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1978 年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到 1984 年進行全面經濟體制改革前，這一階段的改革重點是精簡政府機構，主要是恢復和調整各級政府機構；第二階段是從 1984 年全面經濟體制改革以後到 1993 年十四大召開以前，這一階段是探索階段，由精簡機構向政府職能轉變過渡，為適應經濟體制改革，政府改革的目標就是「簡政放權，政企分開」，實質上就是一個權力下放的過程；第三階段則是從 1993 年中共十四大召開以後至習近平接任總書記，這一階段改革的重點是轉變政府職能，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⁴¹

2002 年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的報告中，將當前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進程作了分類，區分為：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改革和完善決策機制、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推進司法體制改革、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維護社會穩定。⁴²2007 年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政治體制改革作為中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深化，而其具體內涵則包括：擴大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發展基層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實的民主權利、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⁴³而中國大陸在 1998-2009 年期間的政治改革作為中，又以鄉鎮黨委書記等地方黨務職務的「公推直（公）選」最為令以西方觀點作為對中國政治觀察學者所矚目的焦點。

習近平接任中共總書記後，2013 年 11 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與綱要，決定建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兩個新組織，這是中共從組織創新推動體制改革的一大動作。⁴⁴明確了改革的八個關鍵領域：政府治理、競爭政策、土地、金融、公共財政、國有資

and How They Can Be Won, (臺北：臺灣培生教育)，2007 年，頁 25-46。

³⁸ 李克強，〈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報告〉，2016/3/5，見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guowuyuan/2016-03/05/content_5049372.htm，2017/2/20。

³⁹ 劉文斌，〈胡錦濤六二五講化意涵分析〉，《展望與探索》（臺北：展望與探索），期 9，卷 5，2007 年，頁 36。

⁴⁰ 徐斯儉，〈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爭議：一個文獻的回顧〉，《中國大陸研究》，卷 47，期 1，2004 年，頁 2。

⁴¹ 黃正雄，〈中國大陸地方政府體制與組織發展之分析〉，《政策研究學報》（南投：南華大學），期 1，2001 年 7 月，頁 27-50。

⁴² 蔡文軒，〈解釋中國大陸省級政治改革：政績/派系模式的思考〉，《政治科學論叢》（臺北：臺灣大學），期 44，2000 年 6 月，頁 106。

⁴³ 胡錦濤，〈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2007/10/15，見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ldhd/2007-10/24/content_785431.htm，2017/1/15。

⁴⁴ 社評，〈習近平發出政治改革訊號〉，2014/3/20，見

產、創新以及國際貿易和金融的自由化。⁴⁵對此，被視為習近平的軍中盟友，近年來多次公開支持習近平軍隊反腐，並經常發表關於改革、反腐、信仰危機等敏感、強硬言論的劉亞洲胞弟劉亞偉，即於2016年10月在美國舉辦的「中國政治變局與民主前景」的研討會中表示，習近平雖然極少在公開的講話中談及政治改革，但其對政治改革「相當認真」。⁴⁶對照中共六中全會後，2016年1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公布《關於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方案》，在六中全會的公報中，更首次將「監察機關」與「權力與立法機關」（人大）「行政機關」（政府）「司法機關」（法院、檢察院）並提，是國家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實現對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面覆蓋……」。⁴⁷似乎顯示外界對於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九大會中，習近平將會對中共政治體制進行西方民主式的深度改革落實與期望。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320001104-260310>，2017/2/20。

⁴⁵ 沈聯濤、蕭耿，〈習近平的383改革〉，《遠見雜誌》期330，2013年12月，見https://www.gvm.com.tw/Boardcontent_24487.html，2017/2/27。

⁴⁶ 大紀元，〈劉亞洲胞弟：習近平對政治改革相當認真〉，2016/10/4，見<http://www.epochtimes.com/b5/16/10/4/n8364110.htm>，2017/2/5。

⁴⁷ 大紀元，〈陸開展監察體制試點 分析：習近平啟動政改〉，2016/11/19，見<http://www.epochtimes.com/b5/16/11/19/n8508478.htm>，2017/2/15。
<http://www.epochtimes.com/b5/16/11/19/n8508478.htm>

表 1 各省（直轄市）試行鄉鎮黨委書記「公推直（公）選」的狀況

省 份	實施鄉鎮黨委書記直（公）選的地區	數 目
四 川	南城鄉（1998）、靈山鄉（2001）、木蘭鎮（2003）、大興鎮（2004）、甘溪鎮（2004）、朝陽湖鎮（2004）、光明鄉（2004）、福紅江鄉（2004）、磊呷鄉（2004）、桂花鎮（2004）、新平鎮（2004）、岩口鎮（2004）、蘭草鎮（2004）、坦溪鎮（2004）、涵水鎮（2004）、筆山鄉（2004）、江口鎮（2004）、飛仙關鎮（2004）、遊仙鎮（2005）、歸德鎮（2005）、龍女鎮（2005）、金龍鄉（2006）、雲峰鎮（2006）、柏合鎮（2008）、西河鎮（2008）、團結鎮（2007）、永嘉鄉（2007）、回龍鎮（2007）、富牛鎮（2008）	29
江 蘇	黃墩鎮（2003）、蔡集鎮（2003）、曹集鄉（2003）、歸仁鎮（2004）、龍集鎮（2004）、界集鎮（2004）、十字鎮（2004）、湯潤鎮（2004）、洮西鎮（2004）、梅花鎮（2005）、井頭鎮（2005）、順河鎮（2005）、曉店鎮（2005）、皂河鎮（2005）、陸集鎮（2005）、蔡集鎮（2005）、董浜鎮（2005）、土橋鎮（2005）、王莊鎮（2005）、燕尾港鎮（2005）、馬集鎮（2006）	21
雲 南	金馬鎮（2004）、中樞鎮（2004）、牛街鎮（2004）、龍朋鎮（2004）、壩心鎮（2004）、太安鄉（2006）、船房鄉（2006）、古城區（2006）、光華鄉（2006）	9
貴 州	新蒲鎮（2005）、官倉鎮（2005）、長沙鎮（2005）、擺所鎮（2008）、火鋪鎮（2008）、合馬鎮（2008）	6
內蒙古	西門鋪鎮（2008）、羊群溝鄉（2008）、西橋鎮（2008）、小余太鎮（2008）、紅慶河鎮（2008）、天成鄉（2009）	6
河 南	汜水鎮（2005）、銅冶鎮（2005）、瓦窯溝鄉（2005）、張閣鎮（2005）、大橋鄉（2008）、白營鄉（2009）	6
湖 南	土橋鎮（2006）、和平鎮（2006）、龍頭鋪鎮（2006）、三尖鎮（2007）、白營鄉（2009）	5
浙 江	龍繞鄉（2004）、湮浦鎮（2004）、夾浦鎮（2008）、和平鎮（2008）	4
安 徽	梅林鎮（2004）、萬家鎮（2004）、洮西鎮（2004）、竹峰鎮（2004）	4
山 東	乳山口鎮（2004）、馮家鎮（2004）、徐家鎮（2004）	3
河 北	大崔莊鎮（2008）、燈明寺鎮（2008）、馬城鎮（2008）	3
吉 林	龍沼鎮（2004）、七井子鄉（2004）、叉幹鎮（2005）	3
重 慶	龍興鎮（2004）、天府鎮（2006）	2
陝 西	湘水鎮（2005）、興隆鎮（2005）	2
甘 肅	梁湖鄉（2009）、沙河回族鄉（2009）	2
江 西	操場鄉（2009）	1
湖 北	九道鄉（2005）	1
廣 西	舊州鎮（2008）	1
未實施的直轄市和省份：北京、天津、上海、山西、遼寧、黑龍江、福建、廣東、海南、西藏、青海、寧夏、新疆		

資料來源：蔡文軒，〈解釋中國大陸省級政治改革：政績/派系模式的思考〉，《政治科學論叢》（臺北：臺灣大學），期 44，2009 年 10 月，

表2 中國大陸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方案地區與人事安排

監察委三地試點人事				
序號	省分	官職	姓名	年齡
1	北京	北京市委書記	郭金龍	69
2		北京市代市長	蔡奇	61
3		北京紀委書記	李書磊	52
4	山西	山西省委書記	駱惠寧	62
5		山西省委副書記、省長	樓陽生	57
6		山西省委副書記	黃曉薇	55
7		山西省紀委書記	任建華	59
8	浙江	浙江省省委書記	夏寶龍	64
9		浙江省副書記、代省長	車俊	61
10		浙江省副書記、政法委書記	袁家軍	54
11		浙江省常委、省紀委書記	任澤民	62

資料來源：〈習推五套班子 四手布局政改〉，《新紀元》（臺北：新紀元國際文化），期509，2016/12/8，見<http://www.epochweekly.com/b5/511/17270p2.htm>，2017/2/16。

二、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性質分析

中國大陸係屬中央集權國家，按照中央政府統一領導全國、地方各級政府分級管理的原則管理國家事物，在中央政府國務院之下，設置了金字塔式的逐級向下的地方各級政府，地方各級政府及其機構、部門上下左右交錯，依所規定的地方政府組織形式及關係模式為其結構，至於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則劃分為縱向的「層級結構」與縱橫交錯的「條塊結構」，縱向的層級結構是指在縱向上劃分若干層級，層級的業務性質和職能範圍基本相同，不同層級的管理範圍自上而下逐級縮小，各層級分別對上一層級負責，因而形成政府層級結構。⁴⁸即使在歷經鄧小平、江澤民的高度經濟改革發展期，2002 年中共十六大中決議同意關於中國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和改革的部署，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仍舊強調，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加快建設現代化，仍必須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⁴⁹

2012 年胡錦濤儘管在十八大中報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不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仍

⁴⁸ 黃正雄，〈中國大陸地方政府體制與組織發展之分析〉，《政策研究學報》（南投：南華大學），2001 年 7 月，期 1，頁 27-50。

⁴⁹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決議〉，2002/11/14，見 <http://big5.huaxia.com/zt/2002-36/118823.html>，2017/1/16。

必須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積極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⁵⁰而同時，新一代領導人習近平亦在會中同樣強調，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只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堅持改革開放；既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才能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⁵¹

因此，自鄧小平推動經濟改革開放以來，整體中國社會在經濟高度發展下，中國大陸領導人都強調深化政治改革或積極政治革新，是中國共產黨必須走的道路，但是在此基調下，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雖然在國家治理手段上的範圍與深度都有加大情形，但是不同領導人在任何時期重要決策談話，依然是強調其四個堅持路線，各領導人所強調的政治改革路線從未觸及西方政治民主化的核心觀點，也就是自由選舉與政治的民主化議題。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就是在社會主義政治總格局和權力結構形式不變的前提下，對政權組織、政治組織的相互關係及其運行機制的調整和完善。⁵²尤其是對於中國大陸地方黨職的開放選舉制度普遍試點情況，許多持有西方觀點的學者多認為將是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先機或試腳石，但是對照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對民主的條件來看，中國大陸的所有選舉制度開放，還是必須具備共產黨員的資格，根本不符人民自由選擇的偏好，因而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其實在本質上就不符西方政治民主化的要件，而只是一種趨近於西方公共治理的「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而已。

三、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現代化理論檢證

依據現代化理論的核心「社會經濟的高度發展必然帶來政治民主化」的核心推論，即便江澤民曾經在 1992 年 10 月 12 日中共十四大上報告「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目標是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⁵³雖然經濟上的改革發展促進了現代化理論的推論，但經過 1989 年的六四事件後，中共當權派對於經改後的政治發展路線也重新回到左派的意識型態基調，對於政治議題的處理也更顯格外小心，每次遭遇經濟成長過熱時，就會透過一種宏觀調控的方式予以降溫。⁵⁴即便在改革經濟成長快速時中國大陸的私營企業主（nouveau bourgeoisie），達到 176 萬家，資金高達 1 兆 3,300 億人民幣，私營企業者 395 萬人之際，⁵⁵研究者同時也觀察到江澤民掌控權力方式與毛澤東高度相似，因而不斷勸戒中共幹部不論任何情形應都必須擁護黨的領導核心，堅持共產黨領導路線。⁵⁶這使得共黨體系內部阻斷了民意的「反饋」（feedback）機制，也間接使得庶民百姓對於政治變遷的影響性不若西方國家，因而動搖了民主化理論在適用於中國的可行性。⁵⁷

雖然自 1978 年開始，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即不斷的在推進，但是在經濟市場化的同時，其政治制度卻沒有出現現代化理論中所預測的政治民主化，可能有幾個原因：一是在經濟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渡階段，政府官員的權力成為有利可圖的工具，因此他們不願放

⁵⁰ 胡錦濤，〈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2012/11/9，見 http://hk.crntt.com/doc/1022/9/7/7/102297778_4.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2297778&mdate=1109103500，2017/2/20。

⁵¹ 習近平，〈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十八大報告主線〉，2012/11/27，見 <http://big5.huaxia.com/xw/zdxw/2012/11/3101772.html>，2017/2/1。

⁵² 朱新民《1978-1990 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八十年代後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臺北：永然文化），1991 年。

⁵³ 白沙洲，《江澤民變法》（美國：明鏡出版社），1998 年 12 月一版，頁 79。

⁵⁴ 劉樹成，〈中國經濟週期波動的良好大變形〉，收錄於陳佳貴編，《經濟藍皮書—2008 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7 年，頁 34。

⁵⁵ 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2 年 1 月，頁 17。

⁵⁶ Willy Wo-Lap Lam, *The Era of Jiang Zemin*, N.Y. Prentice Hall, 1999, p.16.

⁵⁷ 蔡文軒，〈解釋中國大陸省級政治改革：政績/派系模式的思考〉，《政治科學論叢》（臺北：臺灣大學），期 44，2000 年 6 月，頁 113。

棄自己手中的既得利益，放手從事政治改革；另一個原因則是，當經濟改革獲得一定的成效時，人民生活水平的相對提高，減輕了對中共當局進行政治改革的壓力與要求。⁵⁸加以現代化理論的西方觀點及發展模式，在體質上原本就與第三世界或東方國家相同，因而西方國家以其過去經驗研究來推論第三世界國家，就很容易發現這些新興國家的政治發展有時候是和西方國家差距很遠，在政治概念上的單純套用是有其適用性上的問題存在。⁵⁹因為對於中國大陸的領導階級而言，以往的各階段政治改革重點是在於政府職能與管理手段上的轉變，其積極目的是在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非透過建立市場機制來改變政治權力結構。

現代化理論所認為經濟發展後所形成的中產階級或知識份子將是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動力，但對於中國大陸而言，中國的知識份子似乎仍深受儒家文化知識份子的諍言角色，以及帝力與我何干的民貴思想影響，而中產階級及興起的企業家等社會菁英也因為中國共產黨開放資本家入黨，⁶⁰為了獲取自身利益上分配的有利位置，而產生逐漸投身公部門或加入共產黨等情形，以致於在本身利益的鞏固上逐漸與中國共產黨產生結合與一致性，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這種政治吸納策略，不免影響了這兩股現代化理論所推論極重要的政治民主化原動力，並未合為一股反對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勢力。依據中共所認定的當前民主建設是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⁶¹當權力掌控者與利益分配者合為一體時，即便中國大陸在經濟高度發展下，私營企業比例的快速增加，現代化理論下的政治民主化道路也就更難以獲取發展契機，因為其根本原因正在於中國大陸在政治改革的相關施行作為，實際上並不是以政治的西方民主化為目標，而僅僅是在為其所謂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道路提供一種政治上的規範和掩護，從而在根本上為日後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獲得正當性。

伍、結論

1978 年年底，中國開始發動經濟體制改革，邁向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⁶²過往現代化論者如 Gorden White 在 *Riding the Tige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中，曾經認為大陸的經濟發展終將使大陸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終將實現。⁶³但此論點在為文後 10 餘年，迄今 30 年的當前看來，似乎現代化理論的預期，國家在經濟發展後必然帶動政治體制的改革與現代化推論，並不適用於中國大陸。雖然胡鞍鋼將一個國家的發展生命週期區分為五個階段：初步成長期（或準備成長期）、迅速成長期（或經濟起飛期）、強盛期、相對緩慢發展期、相對衰落期；而中共在 1950-1980 年代處於準備成長期，其任務在啟動工業化與現代化，完成工業化的「原始積累」；第二個階段為 1980-2020 年代（迅速成長期），工業化與社會化速度加快，社會從封閉走向開放；如果此一階段發展良好，中共有可能在 2020 年進入強盛期。⁶⁴但事實並未顯示中國大陸的經濟高度發展與政治改革的直接關聯。因為在共產國家或中國大陸自稱所謂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所有資產與生產工具，一切仍掌握於國家的手中，開放的程度仍取決於國家權力的掌握者——中國共產黨。因而將現代化理論適用於共產主義國家有一個特殊的困難，那就是這個理論通常假設中產階級（bourgeoisie）是推動民主化的主力，因為現代化帶來了中產階級的興起，而中產階級又自發產生了對民主

⁵⁸ 譚偉恩，〈中國改革開放之政策評析〉，《東亞研究》（臺北：政治大學），卷 36，期 1，2005 年 1 月，頁 5-6。

⁵⁹ 吳文程，《政治發展與民主轉型》（臺北：五南文化），2007 年，頁 142。

⁶⁰ 宋海慶，《論三個代表的形成過程》（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2003 年 3 月，頁 15。

⁶¹ 劉文斌，〈胡錦濤六二五講化意涵分析〉，《展望與探索》（臺北：展望與探索），期 9，卷 5，2007 年，頁 37。

⁶² 譚偉恩，〈中國改革開放之政策評析〉，《東亞研究》（臺北：政治大學），卷 36，期 1，2005 年 1 月，頁 6。

⁶³ Gorden White, *Riding the Tige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⁶⁴ 胡鞍鋼，《中國：新發展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112。

的要求。⁶⁵經過本文的分析發現，雖然自鄧小平 1978 年的經濟改革迄今，中國大陸整體經濟高度發展，中產階級(脫貧人數)亦有數量上的明顯增加，現代化理論論者亦有認為現代化理論所推論的政治民主改革，在中國大陸相關政治改革行為有增強的趨勢情況下，即將隨之而來。此一觀點並未認知倘若大陸中產階級民眾認識到他們的利益是與中國共產黨緊密聯繫在一起時的情況，其結果就可能非現代化理論所能預期，至少變因增加了許多。⁶⁶

整體言，現今中國大陸所謂的民主建設與西方民主建設存在根本上的重大差別，依據著名政治學者 Robert A. Dahl 的看法，認為民主必須具備有形成、表明、選擇偏好的機會，以及政府平等對待民眾的各類偏好，若依此標準，中國大陸的民主建設嚴格規定必須維持中國共產黨的一黨領導，因此使得民主成了「鳥籠民主」，在根本上形成與西方民主的最大差別。⁶⁷因而論者認為，現代化理論者對當前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論點尚恐過於樂觀，因為若就西方政治理論的觀點分析，將可以發現其實近年來有關中國大陸相關的政治改革，如反貪、反腐、減少審批項目等等措施，範圍只不過是屬於國家權力體制下的治理制度調整而已，並非西方政治理論所論對於國家政治權力取得與更迭方式的改變，也就是政治上的民主化、法治化與科層化，而應該將其歸之於國家體制之下的行政改革似乎比較適宜，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也對此表明，中國共產黨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就是「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其核心就是「國家治理現代化」，並將「國家治理」及「治國理政」兩者解釋為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內容和形式，國家治理現代化是特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的治理現代化，而不是泛指任何別的性質的國家治理現代化。⁶⁸也就在根本上指出了中國大陸現行有關的政治改革程度與範圍僅限制於國家行政治理方式上的改變，對於治理國家的方式仍舊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模式。

1990 年代，美國國防部曾委託多位學者組成研究小組，針對中共政權的前景加以分析，結果學者意見分歧，有一派學者認中共政權無法存活到二十一世紀，⁶⁹而長期研究中國大陸政治情勢的學者金耀基亦曾指出，就組織而言，中國大陸龐大的官僚系統，係以黨作為最高價值，再加上文革時期的破壞，幹部素質的腐敗等等因素，使得現代化之路荊棘遍佈，即使領導層意識到官僚系統的問題，但在改革與重建上需要龐大的心力，在現代化的改革道路上仍有努力的空間。⁷⁰因此，現代化理論應用於中國大陸在經濟發展後的政治改革議題，並非不可期待，但相較過往現代化理論在世界其他地區國家的適用，對於中國大陸而言，基於承載體之政治、社會、文化、民族性等特性相異的變因，現代化理論的適用或再演繹，似仍有待時間再次檢證。

⁶⁵ 吳玉山，〈現代化理論與政權穩定論〉，《政治科學論叢》(臺北：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期 9，1998 年 6 月，頁 446。

⁶⁶ Richard Baum, "China After Deng: Ten Scenarios in Search of Reality," *China Quarterly*, no. 145 (March 1996), pp.153-175。

⁶⁷ 劉文斌，〈胡錦濤六二五講化意涵分析〉，《展望與探索》(臺北：展望與探索)，期 9，卷 5，2007 年，頁 38。

⁶⁸ 邱海平，〈習近平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是重大理論創新〉，《觀察》，2017/1/6，見

<http://www.cwzg.cn/politics/201701/33532.html>，2017/2/1。

⁶⁹ 林文程，〈中國大陸政治改革議題〉，見 <http://www.feu.edu.tw/edu/gec/linhuang/china/policy-content.htm>，2017/2/20。

⁷⁰ 金耀基，〈中共社會主義之困境—論中共三十年來的意理與組織〉，《中國論壇》，期 9，卷 3，1979 年 11 月，頁 4-12。

The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under Economical Development—Reexamin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Theory

Mei –Jyh Tse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DU, Taiwan, R.O.C.

Abstract

From Adam Smith—pioneer of political economics, Herbert Spencer—great British scholar of sociology, Talcott Parsons—bringing European sociology to the United States, Seymour Martin Lipset—famous scholar of political sociology to Samuel Huntington—great scholar of modern politics and expert in modernization, all believe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bring dramatic change in society, multiplicity of value, and the requirement of a democracy needed to resolve various conflicts in benefits. The modernization theory is the one that emphasizes the existence of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 economic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system in a country. However, following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its economic reform in 1978, the political reform has not yet come as this theory predicted. Are there different significant variables in term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in other areas? Therefore, this study reexamines the modernization theory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economical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and its political reform.

Key Words : Modernization Theory, Economical Development, Political Reform, Planned Economy, Market Economy